

新文学

第一辑



大象出版社

新文学

第一辑

主编

陈飞 张宁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第一辑/陈飞,张宁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10

ISBN 7-5347-3151-8

I. 新... II. ①陈... ②张... III. 文学研究—中国
—文集 IV. 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3596 号

出版人 李亚娜

策划人 耿相新

特约编辑 林 军

责任编辑 郭一凡

责任校对 石慧明

封面设计 秘金通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制 版 河南大象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403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33.90 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委员 王富仁 刘思谦 孙 歌 罗宗强
洪子诚 项 楚 耿占春 袁行霈
钱理群 童庆炳 董乃斌 詹福瑞
主任 傅璇琮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委员 邓小军 叶舒宪 左东岭 吕伟民
张宏生 李继凯 罗 岗 赵京华
贺照田 倪 伟 党圣元 徐 俊
郭英剑 郭英德 康保成 傅 刚
蒋 寅 樊善标
主编 陈 飞 张 宁
编 辑 李 亚

发刊词

站在新世纪的这边，回首对岸，一切虽相去未远，竟显得有些朦胧模糊和虚无——这里当然说的是“文学”，更具体地说是“文学研究”。

就连已经习惯了自我鉴定、老练于自我表彰的今人，在检点刚刚过去的世纪的文学研究时，也不能不感到些许汗颜，可数的“家珍”确乎有限，储宝囊未免有点羞涩，多乎哉不多也！但纸做的和字面的“成果”却是堆积得越来越如山。

说起来近乎“危言”：我们甚至对“文学”尤其是中国的“文学”是什么，都没能审视清楚，梳理明白，把握准确。在大多数场合，人们谈论的其实不是文学，不是中国的文学，甚至不是自己内心真实理解的文学，而是人云亦云，将错就错，生米已然熟饭，日子久了浑然不觉。

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文学的本质、原则、精神、权力或阵地，也在节节放弃。当舶来的货色堆积市面围者蜂拥人头攒动时，有谁愿意关注中国文学的“本义”？当电闪雷鸣风暴骤至雨雹交加草木摧折时，有谁能够坚守中国文学的“使命”？当盛宴一字儿排开丝竹盈耳佳人满抱“日理万机”时，谁还有暇去深思中国文学的“实质”，探求中国文学的“精神”？于是在文学里看不到“天”，看不到“道”，看不到“忧患”与“发愤”，看不到“寂寞”与“清高”，直至看不到“自己”。

直到如今，文学研究甚至还没有自己的“科学”和“学科”——这里当然不是指官方的“目录”和“数据”。连一些早已“江湖”上如雷贯耳的成名“专家”，一旦涉及自己研究的学科定义、界限、内涵、目的、理论、方法、评价、标准等一系列“基本功”时，往往语焉而不详，王顾左右；言及本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的条件和要素，更是未及留心，姑待后人。至于大众，无论是口耳之间，还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网络，很少有关于这一学科的清楚意识、明确分类和专门主题。一门差不多已有近百年“现代”研究的学问，竟到了这一步田地！不是没有，也不是不可能，只是须要自觉艰苦的创造和建立。

甚至连长期“约定俗成”的“规矩”都不讲了：从只言片段的抄袭剽窃，到整篇整本的制假作伪；从名报名刊的“无奈”补偿，到名家名流的“痛苦”笑纳；从“学术批评”的嬉笑怒骂，到“科学研究”的圈地占山；还有那摩肩接踵的“跑点”、“跑职”、“跑项目”……相比之下，对一般常识性错误和失实的“拒不承认”，倒成为不必“认真”的事情了。

热热闹闹浑然不觉之中就“跨”过了世纪，像老婆婆搬家，大包小包又都带了过来，加上一路的捡拾，抖落开来，也可谓五色杂陈，光怪陆离，令人大开眼界，有些

早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了。说起来有时浑作笑谈，想下去简直可比“SARS”。

然而情形并不完全都是这样。“旧”世纪毕竟是在走向“新”世纪，新世纪毕竟是年轻的世纪，毕竟年轻的人搬家更为普遍和经常：该带过来的一般也不会落下，加上新的置办，便成为新生活建立的“家底”，新的希望和梦想的温床。

《新文学》或许就是我们带过来呈给新世纪新生活新希望新梦想的献礼。

为了筹备这份献礼，早在上世纪末人们忙于“眺望”或苦于“无望”之际，我们就在上下求索，反复商量了，并且与一向在人文事业上怀抱甚高、投入甚力的大象出版社不谋而合。“合谋”的结果，大象出版社决定为新世纪奉上一份“大礼”：同时编辑出版《新文学》、《新哲学》和《新史学》。《新文学》也因此有了自己的姊妹和同道，并且可以平静于自己的“微薄”。

与姊妹和同道站在一起时，“文学”的本义才更加彰显：她与“哲学”、“史学”一样，原本是一门学问。只是由于长期地被几乎无限地随处使用，才逐渐模糊和转移了她本来的面貌与涵义。也就是说，《新文学》只是一个学术性出版物，这里只有学术文章，而没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之类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作品。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学》在关注传统的古代文学传承的同时，还将关注20世纪以及新世纪的文学现象、文学团体和文学理论等。

在汉语里，“新”有两个重要义项：一是“吐故纳新”之“新”，张开怀抱，吸纳新鲜，吐弃废旧，就像呼吸——这是生命存在的必要形式；二是“推陈出新”之“新”，即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维新，实现更新——这是生命发展的必要形式。我们的文学研究，要保持和增强自身的学术生命力，舍此似无他途。

“新”并不仅仅是时间顺序上的晚出，也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初现。这些只是形式，而在实质上，“新”是合理和更加合理。从学术上说，就是科学和更加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新”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合理；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只要科学，均在“新”之列，皆可取而“新”之。

至于究竟怎样才是合理，如何能够科学，不是编辑出版者所能包揽的问题，需要由学者、作者以及读者的共同努力，学术的不断进展来给出和完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自身从眼前从具体事情上一点点地做起。我们将努力呈现的是：一种谦虚严谨的学术态度，一种坚忍扎实的治学精神，一种无征不信的研究方法，一种精益求精的为学作风，一种活泼自由的学者心灵，一种平和服善的交流姿态……从而，不仅可以了解到问题的解决，科学的进展，还可以感受到学者的真诚，领悟到学术的神圣和安详。这些看上去仿佛老生常谈，但“常谈”未必没有新意。

古云：白头如新，倾盖如旧。“新”与“旧”不在形式，不必对立，相互涵容，以时转换。交友如此，处事如此，治学亦如此，人间事物何不如此？

以友以仁，共之勉之，常在常新。

目 录

名家述学

- 我怎样学习古典文学 曹道衡(1)
从《雪赋》、《月赋》看南朝文风之流变 曹道衡(6)
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和文艺 曹道衡(14)

专题评介

- 唐肃宗朝翰林学士传 傅璇琮(29)
求实与创新
——傅璇琮先生的学术精神 胡可先(45)

海外学坛

- 生老病死之戏要——启功 木山英雄(68)
性别与经典
——男性文人眼中的明清女诗人 孙康宜(77)

古典新义

- 依违于妇德与才性之间
——《世说新语·贤媛篇》的女性风貌 梅家玲(89)
欲望尘世/境内蓬莱
——《拾遗记》的中国图像 刘苑如(108)
韩偓《八月六日作四首》诗笺证 邓小军(132)

文学沉思

- 梦的编年史
——《哈扎尔辞典》呈现的一种小说可能性 耿占春(143)
对文学的认识和文学式的认识
——关于胡风创作论的思考 黄 悅(163)
《浮士德》的辩证思想
——文学与思想史研究片论 叶舒宪(188)
从张说的天人观、礼乐观看其文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戚 清(196)

源流考索

“文史”与“诗文评”

- 论文学批评的分类 傅刚(213)
论汉语古典诗学形式理论的系统结构
——兼论古代文论系统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刘方喜(222)
唐词、唐曲子及其相关问题
——一段敦煌学公案的学术史观照 徐俊(244)

别样眼光

椅子和树

- 诗人钟鸣论 敬东(261)
那些不见得透明的
——尝试谈论三篇有关斗牛的散文 樊善标(282)

寻找真实接触

- 致韩国读者 孙歌(292)
新的“文化围剿”
——略说当下流行文化语境中的鲁迅 李继凯(300)
印刷品、文学史和诗歌义和团 王晓渔(306)

骆驼草

- 谈“混合的游戏”(外两篇) 张宁(310)

书前书后

- 《中国文学传播史》论纲 陈桐生(316)
《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序 董乃斌(322)
《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后记 陈飞(326)

CONTENTS

【Expert's Comment】

- How I Study Classical Literature Cao Daohe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riting Style in Southern Dynasties Cao Daoheng
On the Academy and Artistic Studies of the Heshuo Region in Northern Dynasties Cao Daoheng

【Review on Special Topics】

- The Biography of Hanlin Scholars in Suzong Era of Tang Dynasty Fu Xuancong
Being Realistic and Innovative—the Academic Spirit of Professor Fu Xuancong Hu Kexian
【Overseas Learning Platform】
- The Games Played with Life—Qi Gong Kiyama Hideo
Sex and Classics—Female Poet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Eyes of Male Intellectuals Sun Kangyi

【New Meanings to the Classics】

- Analy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 Virtues and Artistic Talents—the Female Features in *ShiShuoXinYu* · *XianYuanPian* Mei Jialing
Vanities of Desire and Worldly Fairyland—the Pictures of China in *ShiYiJi* Liu Yuanru
Authentication of Han Wo's Poems—*Four Poems Written on August 6th* DengXiaojun

【Reflection on Literature】

- Chronicle of Dreams—One Possibility of Novel in *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Geng Zhanhun
Perceptions o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Style—Reflection on Hu Feng's Theory of Creative Writing Huang Yue

- The Dialectical Ideas of *Doctor Faustus*—Discussion on the Research of Literature
and Ideological History Ye Shuxian
-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ZhangYue's Literary Ideas about Heaven
and Man & Courtesy and Music Zang Qing
- [Investigation of Origin and Development]**
- Literary History & Comments on Poetry and Literary Writing,—an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ry Commentary Fu Gang
- On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heory—a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Writing and Nationalization Liu Fangxi
- TangCi , TangQu and Related Questions—a Reflection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a Complicated Case of Dunhuang Studies Xu Jun
- [Another Vision]**
- Chairs and Trees—on Poet Zhong Ming Jing Wendong
- “The Ambiguous”—Prose about Bullfight Fan Shanbiao
- Seeking Actual Contact—to South Korean Readers Sun Ge
- A New “Suffocation Culture”—a Brief Discussion on Lu Xun under the
Prevailing Cultural Linguistic Environment Li Jikai
- Printed Matter, History and Yihetuan Poems Wang Xiaoyu
- [Camel Thorn]**
- On “Mixed Games” (Two More Articles) Zhang Ning
-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Dissemination* Chen Tongsheng
- Preface to the *Synopsis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of Books* Dong Naibing
- Postscript to the *Synopsis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of Books* Chen Fei

我怎样学习古典文学

曹道衡

提到治学的方法，不禁使我感到十分惶恐。说老实话，像我这样的人要来谈这个问题，真是“谈何容易”。不得已，只能讲讲自己的学习过程吧！

一

有不少人说，我可以算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确，我家先辈和亲戚中确实有不少知名的学者。但具体到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他们起初要我读古书，学写文言文，并非要我去研究文史，而是为了能阅读中医古籍和写“脉案”（过去的中医在药方前面要有一段文字，介绍病情及治疗方案），而这种“脉案”是要用文言文写的。我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我才九岁。那一年，我祖父请了一位女老师，教我读《论语》，起初时完全不懂，只是死背死记。不久，苏州沦陷，我的舅父潘景郑先生避难来沪，祖父就请他教我读书。这样，在潘先生教导下，我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开始能写一些简单的文言作文。这时，有不少人劝祖父让我去受新式教育，于是我就去考上一所中学，念到初中二年级，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租界。祖父认为再去学校上学，要念日语，是奇耻大辱，就叫我辍学，继续跟潘先生学古文，读《左传》。后来潘先生到合众图书馆工作，没有时间教我。祖父又请了一位先生教我读书，读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和《公羊传》。抗战胜利后，那位老师也回苏州工作，我就自学《尔雅》、《周易》等书，同时也读过《老子》、《庄子》和《荀子》。那时我年龄渐长，感到自己没有学历，将来难于立足社会，就报考了无锡国专的上海分校。在国专念了三年，毕业时正好是1949年全国解放，当时尚没有统一分配的制度，所以只好在家呆了一年。在国专的三年和毕业后的一年里，我觉得自己在“十三经”中还有好几部未读，就自己点读了《周礼》和《谷梁传》，只有《仪礼》觉得太难读，就没有读下去。此外，我还点读了《通鉴》、《史记》和《汉书》，还读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顾炎武《日知录》、王念孙《读书杂志》等书。这都是舅父潘先生和姨丈顾廷龙先生指点我去读的。在国专时，我听了童丕绳先生的《春秋战国史》和《秦汉史》等课程，对历史产生了兴趣。童先生又指点我阅读《古史辨》和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使我对五四以后的史学方法有所了解。

1950年,我又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三年级插班生,来到北京。当时我很想跟游泽承先生学中国文学史,但刚上了两节课,就跟随全班同学去江西万安参加土改。回京只上了六个星期课,就毕业分配到中央文学研究所(今鲁迅文学院前身)。在那里,我工作很不安心,因为我不想搞创作。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大约十个月,1953年夏初,我又被调回北大,到北大文学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到所不久,就到了古代组。当时何其芳先生领导古代组同志,准备写一部文学史,先从《诗经》研究起。那时规定,每个星期一下午,在北大燕东园何先生寓所开会,把《诗经》逐首讨论。每次开会,游先生和余冠英先生都来,常常深入讨论《诗经》篇义。我觉得每次开会,都得到许多收获,对我的提高有很大推动。同时,《光明日报》办了《文学遗产》副刊,派我作编委会秘书,经常到游先生、余先生家去请教。有一次,我到游先生家去请教《诗经》问题,游先生并不翻阅任何资料,只是凭记忆讲了三个多钟点,介绍了从汉至清的一百多部有关《诗经》的著作,指出版本及书的优缺点,都一一举出具体例子。我回去后曾去翻阅这些书,无一不合。这件事对我印象极深。最近我在《书品》上看到经富先生文章,讲起已故的程千帆先生说,过去的老专家像冰山一样,基础在水下,浮出水面的才一点点。程先生讲这话,有自谦之意,而像我们这些人来说确实差得太远。近来有些人说我“谦虚”,也有人因为我议论某些时贤而说我有傲气。其实我自以为并不谦虚,也不敢傲,只是见到了真正有学问的大师,才觉得不论自己还是另一些人实在渺不足道。

二

从来治学术的人,都知道“偏枯”之害,譬如说,研究上古文学而不知近代文学,或者反之,这样就很难对中国文学史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这个道理,我未尝不知道,但实际上做得很差。这里有主观上和客观条件的种种原因。当我刚到文学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时,因为工作需要,也写过一些有关清初思想家的文章。但后来就把精力投向先秦至隋,尤其是南北朝文学。我当时对这问题是有所考虑的。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对先秦至隋一段比宋以后的部分要熟悉一些;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当时文学所已由北大划归科学院,早晚要迁出北大,无法利用图书馆藏书。我觉得研究先秦至隋文学,应用的多为常见书,而宋元以后文学,则必然涉及一些较少见的书籍,所以更加强了我投向先秦至隋文学的想法。不过,我当时还是知道要避免偏枯之弊,也买过一些宋以后的史书和文学作品,想补充一下知识面。然而那时已是1957年,接着就是一系列政治活动,连自己担任的课题也无法顾及,不要说想业余读些书了。等到十年动乱结束,我已年近半百,自觉再没有主攻方向,便会一无所成,所以只能把精力全部放在魏晋南北朝方面。如果说“偏枯”,这一时期确实如此,也是不得已。

除了这种“偏枯”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古人所谓“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并重,不可偏废”的问题。我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往往在考据方面下功夫较多,而对“义理”、“辞章”不大熟悉。但这种情况,我并不认为是“偏枯”。因为“三者并重,不可偏废”这句话,虽然完全正确,却针对一个时代总的情况而论,不一定以此要求每个具体的人。因为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往往各得其性之所近,很难要求一律,也不可能没有各自的所长和所短。关于我对“义理”之学尤其“辞章”方面之短,多少还是有些认识的。亡友沈玉成兄当年对我的劝告,我至今铭感。至于某些人把“辞章之学”当作一切,作为文学所的人似乎舍此以外,别无他途。我看未免狭隘了。

三

也许和我长期偏重考证有关,我总觉得对一些较重大的学术问题的认识,往往要从具体甚至细小的问题着手,逐步深入,才能真正了解的。打个比喻来说,我们要发现一片大油田,总得做多次的钻探,每次钻探即使有所发现,还不可能完全证明这里是否有大油田,值得开采,但发现油田的手段却正是钻探。如果因为一个具体的钻井没有出油或不能证明有丰富油气,就否定钻探的作用,那显然是大谬不然。毛泽东同志论革命战争往往讲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和阵地战发展,都是这个道理。现在大家讲治学,很推崇陈寅恪、钱钟书两位先生。我看这两位先生的著作,往往也是从具体的问题入手,逐渐扩展出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两位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大家公认的,但他们丝毫不放弃微观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掀起一阵风,强调所谓的“宏观研究”,看不起“微观研究”。当时我就很不赞成。我认为二者不应对立,宏观要以微观为基础,微观要以宏观为目的。那些提倡宏观的人,也许看到过去有些人的研究方法过于琐细,才有此议。其实宏观的认识往往要提高到理论的层次上,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至于微观的研究,有时仅限于一字一句的解释或某一典籍之真伪、某一时间之真相等等,基本上靠史料和证据说话,略近于感性认识的阶段。谁也不会否认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宏观研究的层次高于微观研究。但是微观研究毕竟是基础。如果缺乏微观的功夫,光凭第二手材料去作“宏观研究”,所得结论能靠得住吗?这些年来有些人提出过不少重大问题,发表了洋洋洒洒的大文章,而主要根据有时竟经不起复核原材料,有的还是在清代已有人证明是伪书的材料。这种学风难道值得提倡吗?当然,前人有些考证文章过于烦琐,结论也未必都对,但总不能“因噎废食”吧!所以我觉得微观应以宏观为目的。我这种想法,曾得罪过某些人,然而至今不悔,即由于此。

四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我读的书很少，但我对“坐冷板凳”的重要性，多少还是有所认识的。现在回顾这些年来自己发表的一些文章，其中较受到别人赞许的，大抵集中在南北朝方面，这大约和我曾把“南北八书”和《南史》、《北史》通读过三四遍以及手抄过二十多家当时诗人的集子有关。我这样做，最初并不很自觉，只是觉得年纪大了，记不住，读一遍不行，再读一遍。至于手抄诗集，更不是有意为之，只是因为十年动乱中不少书丢了。当时我穷，买不起，有些书也买不到，才决心借来手抄。但这样做，确实加深了印象。根据我近几年的体会，如果我写一篇关于先秦两汉的文章，所花功夫往往比写一篇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章要多花三分之一以上时间。这原因就在那部分书，我虽然读过，但已是几十年前读的，印象已淡，查一条材料常要费时间，不像南北朝史料只要翻一下书，往往就能查到。

尽管我比较重视通读典籍和使用第一手材料，但在工作中出差错的现象还是不少的。例如：台湾省藏有一部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此书我原来不知道。后来游志诚先生送给郑州大学古籍所一部，我曾见到，却未细看。只是复制了此书的目录，发现其中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一文居孔融《论盛孝章书》之前，从时代来说，自然是对的。于是在一篇文章中说到陈八郎本不误。过了些日子，台湾的刘显叔先生送给我一部陈八郎本，我仔细一读，发现我完全错了。因为陈八郎本原书也是孔居朱前，那目录是后来人加的。从此，我知道写文章不切切实实了解材料原貌是不行的，不但从他人文章中转引不可靠，连见了本书目录而不看本文，也还是会出错。再有是我们引证古书中史料，有时因为原书已佚，不能不从类书或别的书中转引。这实在是出于无法见到原书之故。但若是其书尚存，而去别的书中转引则应尽量避免。因为万一引文有误，或引者有意断章取义，就会上当。这本是简单的道理，而我这样说，竟也曾得罪某些时贤，但我也至今不悔。

五

我在研究工作中使用的都是传统的方法，并无创新，这是事实。不过曾有人认为我反对学习西方新学说，则我并不承认。我认为研究工作本来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法，正如古人所谓“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各种不同的方法，本可并存，不必执此非彼。尤其像我这样对那些新学说一无所知，又何以加以非议？问题是我没有在工作中使用，就认为我反对，这“罪名”是不能成立的。正像我这个人没有宗教信仰，但总不能说我干涉别人的信仰吧！我为什么没有去学这些新学说？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到上世纪 80 年代，已近花甲之年，再去“邯

“邯郸学步”，恐非良计。再说我的外语，在早年尚勉强能看些英文书，到 80 年代，已经荒疏，而且即使能看，那些外国书又从何处去找？即使找到，也未必能买得起。何况当时那些标榜新学说的人，往往抬出法、德、意大利的名人来，又叫我何从理解其奥义？从前鸠摩罗什已反对过“嚼饭与人”，而这些先生所讲的新学说，我还担心像刘基《郁离子》中说的并非中山之酒，而是糟液呢？所以我的不学新方法，非敢反对也，实在不知从何学起而已。再说当年这些先生气势汹汹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停业整顿”。我正恐这套办法并非舶来品而是“土货”，是嬴政老先生的嫡传！如果真是洋货，那亦非新品，而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货！

六

我近几年来在研究工作中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等社会意识和当时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这种想法，大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构思《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一书时，已经开始。我总觉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命题是正确的，只是我们过去在理解上陷于机械论，才出现了不少缺点错误。近年来有些人为了纠正这种偏向，很强调所谓的“主体意识”。不错，主体这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人们的意识总是头脑对客观世界加工改造的结果。所以人的意识不可能全同于客观事物，也难以全部认识客观世界的真相。但我始终认为人之初生，总是一无所知，像白纸一样，一切思想意识归根结底是受外界影响的结果，所以即使研究一个人的主观世界，还得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入手。所以我曾经考虑从地域、家族等方面来考察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情况，例如我在《燕京学报》新 13 期即将刊出的《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和文艺》及《文学遗产》今年第 3 期上发表的《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和文化》是研究北朝文学的地域问题；《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今年第 3 期上发表的《略论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则是研究南朝文学的地域区别。这些文章可以说是过去所作《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的继续。另外，我近年还在考虑南北朝文学与各士族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思考得更早些。如《文学遗产》1985 年发表的《从〈雪赋〉、〈月赋〉看南朝文风之流变》一文，已初步涉及谢氏家族的兴衰。后来在《文史知识》上，我又曾对南朝王谢二族的问题进行论述。最近，还在考虑再作深入的探讨。除了这些问题外，还有一个设想，就是把文学史和其他学术部门联系起来考察，我曾经作过一些尝试，但因涉及的面太广，做得不多。现在所选的两篇文章，一篇作于上世纪 80 年代，而另一篇则作于本世纪初，这也许可以使读者对我近年工作有个了解，至于这二十多年中，究竟有无分寸之长进，实在很难说。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有的人也许会因此气馁。但如果人人这样想，学术又焉能进步？所以我想只要我还有精力工作，我不想停止我的努力！

从《雪赋》、《月赋》看南朝文风之流变

曹道衡

谢惠连的《雪赋》和谢庄的《月赋》是南朝小赋中的名篇。历来的选家和评论家们往往把这两篇赋看作同一类型。如萧统《文选》在选录它们时，就把它们同入“物色”一类。近人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则仅收《月赋》，据编注者在《前言》中说，这是为了精简，“每一类型的赋，尽可能不重复入选”。这两篇赋之所以被视为同属一种类型，主要是因为它们写的都是自然景物，而且手法上又都是托诸古代文人之口。但是对这两篇赋的评价，历来也有不同看法。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曾认为《雪赋》胜于《月赋》；瞿蜕园取《月赋》而不录《雪赋》，则似以为前者更好。在我个人来说，也觉《月赋》稍胜。但这纯属个人的喜爱，恐怕很难有一致的看法。其实这种评价问题，往往反映着作品本身各自的特点。因为《雪赋》与《月赋》虽可归入同一类型，而从思想倾向到艺术特点都有较显著的区别。这种区别来源于作者们的历史环境、生活经历以及文学发展不同阶段。在这里，我想就这几个方面谈一些初步的看法，请大家指正。

一、关于谢惠连和谢庄的身世

谢惠连和谢庄同属陈郡谢氏，在南朝是著名的高门。谢惠连生于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卒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谢庄生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两人生活的时代，相差最多不过三十多年，如果单纯从时间和两人的门第来看，似不应有太大的区别。然而我们只要仔细考察一下从东晋末到刘宋后期这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就可以发现陈郡谢氏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遭受了一系列的变故。这些变故和教训不能不影响到作者的思想及创作。谢庄《月赋》和谢惠连《雪赋》的区别，恐怕也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如果我们反复阅读这两篇赋，就不难发现它们的情调不很相同。《雪赋》是假托西汉的梁孝王在菟园赏雪，招来了邹阳、枚乘和司马相如等文人，一起咏雪。他们各逞文才，竭力铺陈雪的典故，刻画雪景，主要以写景见长，通篇的情调是写宾主相得，情调是乐观的。《月赋》则假托曹植在应玚、刘桢死后，情绪不佳，在月夜和

王粲一起望月怀旧①，整篇赋都贯彻着凄凉寂寞的情调，尤其“情纡轸其何托，诉皓月而长歌”一语，更烘托着两人的心境，一般来说，《雪赋》是景多于情，而《月赋》则情胜于景。这种差别正是有些读者更喜爱《雪赋》而另一些读者更欣赏《月赋》的原因。

要是我们探讨一下谢惠连和谢庄的生平，还可以发现一种矛盾的现象。那就是谢惠连一生在仕途上很不得志，早年因居父丧时赠诗给会稽郡吏杜德灵，受到非议，不能出仕。后来因殷景仁向宋文帝说情，才被任为彭城王刘义康的法曹参军之职。这个官职本甚卑小，而且此时离他去世仅三年左右。谢庄的情况与此相反，他早年即以文才见赏于宋文帝，初为始兴王刘濬后军法曹行参军，又转太子舍人，他的文名在元嘉后期已传至北魏；到宋孝武帝时，他已官至吏部尚书的显职，最后做到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官位不为不高。从两人的生平来看，似乎谢惠连的赋应该有更多的牢骚，而谢庄则应较为乐观，而事实恰与此相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陈郡谢氏作为南朝的高门大族，始于东晋中期以后。人们虽习惯于将“王谢”并称，其实在东晋初年，谢氏的地位，还不足与王氏并提。所以当时人有“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之语。《世说新语·排调篇》载：“诸葛令（恢）、王丞相（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这是一句玩笑话，却可见当时足以与琅琊王氏抗衡的高门是诸葛氏而非谢氏。《世说新语·方正篇》又载，谢裒（谢安之父）曾向诸葛恢提议结为儿女亲家，遭到拒绝，其主要原因即在诸葛恢认为谢家门第还不够与自己结亲。谢家的兴起主要是由于谢安在应付桓温的跋扈以及后来淝水之战中他和谢玄挫败前秦的大功。谢家贵显以后，也曾引起某些士人的不满。《世说新语·方正篇》载：“韩康伯病，柱杖前庭消摇，见诸谢皆富贵，轰隆道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

谢家的兴盛并不很久，在谢安和谢玄死后，这个家族就遭到了一系列的厄运。谢安之子谢琰在东晋末年镇压孙恩起义中兵败被杀。谢琰子谢混又在刘裕和刘毅的争权斗争中，因站在刘毅方面而被杀。谢安之兄谢据的曾孙谢晦，因参与杀害宋少帝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的事，于元嘉初年被宋文帝所诛。谢玄的孙子谢灵运又在元嘉十年被人诬为造反而被杀。接着，谢据的又一些曾孙谢综和谢约也在元嘉十二年因参预范晔密谋杀害宋文帝一案被杀。谢综之弟谢纬，虽未参预，也被流放到广州。这一系列事变，对谢庄来说，都是他所熟知有的甚至是目睹的。对于谢惠连来说他对晋末宋初的事虽然知道得很清楚，而后来谢灵运及谢综、谢约之死，至少在他写作《雪赋》时，尚未发生。这样的不同情况，对两人的思想及创作，自然会

① 这篇赋当然纯属假托。事实上王粲比应、刘先死，而且他们去世时，曹植尚未封陈王。这些不合史实的情节，我们可以姑置勿论。